

“赤峰第二期文化”再认识

武志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赤峰红山后》一书中的“赤峰第二期文化”内涵十分复杂,以往认为它包含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通过对“赤峰第二期文化”包含的各地点遗存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赤峰第二期文化”至少包含了六类(或阶段的)文化遗存,即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文化、燕秦汉遗存和辽代前后的遗存。

关键词: 赤峰第二期文化; 考古学文化; 遗存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对赤峰红山一带进行了调查、发掘,并于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1](以下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的概念。1958年,吕遵谔先生在调查红山遗址后认识到“过去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还包含几个性质面貌不同的阶段,而在其早晚诸阶段间既可以与中原一带对照,又可以看出它们自身的传统关系。”^[2]1961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在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包括两种文化的因素。”并根据夏家店遗址的层位关系和共存器物群,分别将两种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3],从而将赤峰乃至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后,学术界围绕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做了大量的相关的研究,对“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涵也基本上遵循了1961年所提出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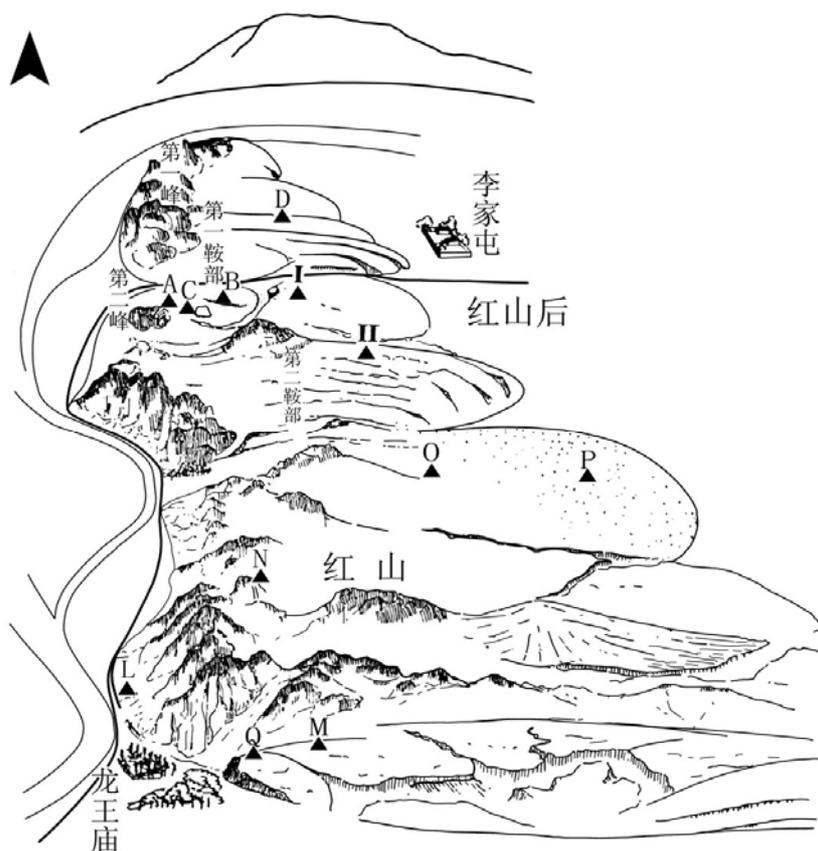
《红山后》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不仅包括石棺墓和第I住地出土遗存,也包括第I住地附近到第一峰顶散布的石制品以及红山前M地点、西崖下L地点、最高峰北侧斜坡N地点、红山后第二鞍部南面O地点、P地点等处遗物(图一),还包括牟田哲二、鸟取森男及岛村孝三郎等收集的“红陶系”遗物。这批材料本身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由于以往缺乏针对这批材料的全面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工作,致使人们对“赤峰第二期文化”内涵的认识,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十分清晰。近年,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当我们重新审视《红山后》一书中的“赤峰第二期文化”遗存时,发现其中具体所包含的远不止两种考古学文化,而至少可以分属六类(或阶段的)文化遗存,即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文化、燕秦汉遗存和辽代前后的遗存。

“赤峰第二期文化”所包括的各地点遗存及其层位关系

在讨论“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涵与性质之前,必须搞清《红山后》报告中归入“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各地点的出土遗存及其层位关系。

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调查、发掘了红山一带的多个地点,其中尤以红山后石棺墓和第I住地、第II住地的发掘最为重要。根据这次调查发掘,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在《红山后》中将赤峰“先史文化”概括为两个阶段:赤峰第一期文化(彩陶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红陶文化),分别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4]。“赤峰第二期文化”,即红陶文

化，以红色磨光陶和“绥远青铜器”^[5]为主要特征。按他们的看法，红山后石棺墓（主要是A、D墓地）出土的陶器皆为红色磨光陶，共存的青铜器、骨器、石器也独具特色；第I住地的三个地点Ia、Ib、Ic包含的红色磨光陶以及石制品与石棺墓的出土遗存文化面貌一致^[6]；第I住地附近到第一峰顶散布的槌斧、有孔石斧等石器与石棺墓、第I住地的石器文化属性一致^[7]；红山前M地点、西崖下L地点、最高峰北侧斜坡N地点以及红山后第二鞍部南面O地点、P地点遗物也被包括在“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容中^[8]。



图一 赤峰红山遗迹鸟瞰图（采自《红山后》）

A—D、M、N、O. 红陶墓地地点 I、L. 红陶住地地点 II. 彩陶住地地点 Q. 灰陶住地地点 P. 细石器散布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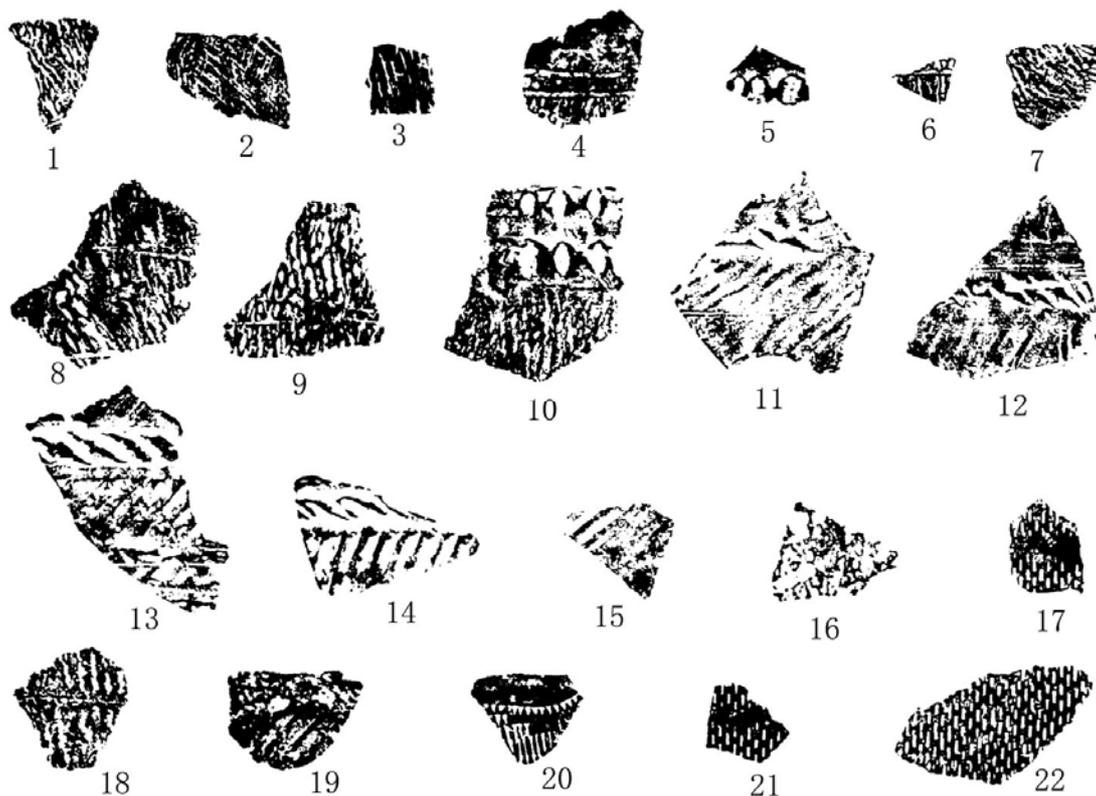
《红山后》中还有一部分收集的“红陶系”遗物也是“赤峰第二期文化”包括的内容，这一点以往没有被论及“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学者注意到。《红山后》一书中提到，虽然这一次的发掘面积不是很大，遗物也不能说丰富，但是可以明确第I住地遗物和石棺墓遗物是一致的。“基于这一见解，可以知道诸家赤峰收集品的所属系统……提及这些遗物是为了再讨论红陶遗物的内容。”^[9]因此，这批“红陶系”遗物毫无疑问被包括在“赤峰第二期文化”中，其中的明刀钱（报告称“泉货”）（图十，1~5）、“绥远青铜器”还被作为推断“赤峰第二期文化”年代的依据。

上述分析表明，《红山后》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包括的内容颇为庞杂。

据《红山后》报导，Ib地点南北向探沟上层为表土，绳席纹陶很多，黑灰色陶片也很多；下层为黑褐色土，仅红色磨光陶发现较多^[10]。这一层位关系实际上是报告得出“赤峰第二期文化”从“红色磨光陶向绳席纹陶发展”认识的层位学基础。

《红山后》根据陶系和纹饰将第I住地出土陶片分为6类：夹砂的红褐色磨光陶、土

质细密的红褐色绳纹陶、土质细密的灰色绳纹陶、土质细密的灰色压印斜线纹陶（报告称“篔目纹”）、土质细密的篔点纹陶（报告称“栉齿列点纹”）以及彩陶，并指出灰色绳纹陶为“汉式陶器”，篔点纹陶则认为是唐代以后的遗存^[11]。《红山后》第十七图（fig. 17）则提供了 Ib 地点上层、下层的陶器纹饰拓片。经分析，下层多为绳纹或绳纹加划纹（如图二，4、8、9），还有压印斜线纹（如图二，13、14）、压印窝点纹（如图二，10）、篔点纹（图二，17）等；上层共发表 5 片，能够辨认的有绳纹加划纹 1 片（图二，18）和篔点纹 3 片（图二，20、21、22），有一片不清晰，可能是绳纹（图二，19）。红色磨光陶皆素面，故不会在 fig. 17 提供的陶器纹饰拓片中。由于上层为表土，出土遗物面貌混杂自然可以理解，但下层除大量的红褐色磨光陶之外也见有红褐色绳纹陶和灰色篔点纹陶。



图二 《红山后》Ib 地点陶器纹饰拓片（采自《红山后》fig. 17）

1—17. Ib 地点下层陶器纹饰拓片 18—22. Ib 地点上层陶器纹饰拓片

按照今天的认识，这几种陶片显然属于不同的时期（详后）。造成这种混乱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发掘过程中未能正确辨识不同的层位和遗迹单位，从而将不同时期的遗存混在了一起；（二）该地点并不存在早期遗存的原生单位，早期遗存混杂在晚期地层中。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有的。我国学者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指出《红山后》Ib、Ic 地点的层位是混乱的，未能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战国、汉代的文化遗存区分开来^[12]。现在看来，这一批评虽有道理，却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当时发掘的 Ib、Ic 地点原本就没有了早期遗存的原生单位。再者，也未注意到 Ib 地点下层出土遗物中最晚的乃是以灰色篔点纹陶为代表的辽代前后的遗存。不管怎样，Ib 地点上下层出土遗物的混杂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层位关系也显然无法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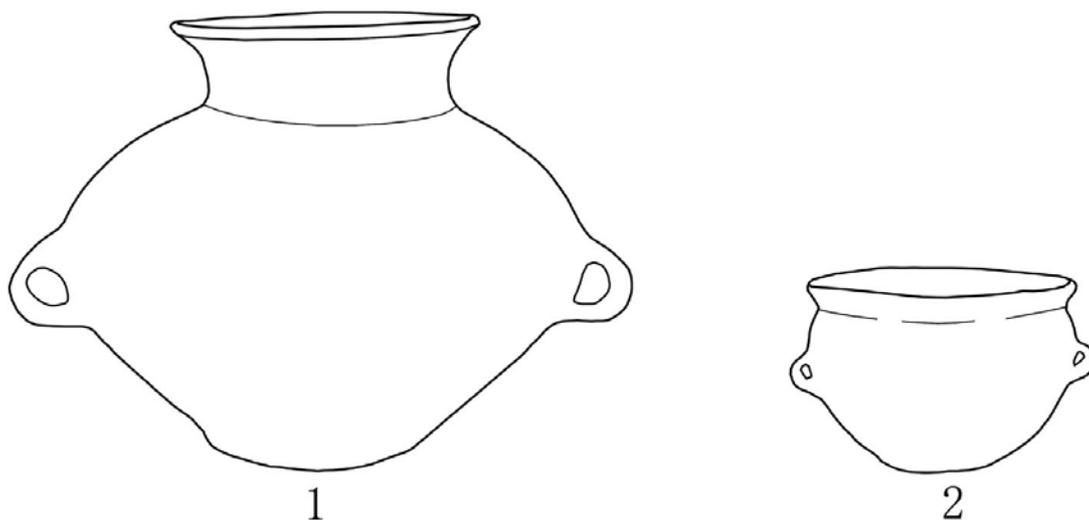
“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实际内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取得很大进展，除在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陆续辨识出几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外，对已识别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这对重

新认识“赤峰第二期文化”无疑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对“赤峰第二期文化”包括的各地点遗存的仔细分析，我们将其分为六类（或阶段的）性质不同的文化遗存：

A类 小河沿文化^[13]

包括《红山后》一书中收录的“红陶系”收集品 fig. 22—9“环耳壶”、fig. 22—10“碗”（图三，1、2）。



图三 A类遗存（1/3）

1、2. “红陶系”收集品（fig. 22—9、fig. 22—10）

根据以往的认识，小河沿文化主要分布在以赤峰为中心的老哈河流域，另外在大、小凌河流域也有零星发现^[14]。从近年对克什克腾旗上店^[15]、林西井沟子^[16]等遗址的调查看，小河沿文化因素也远布到了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地区。但是限于材料的不足，目前尚缺乏对这类遗存的综合性研究。fig. 22—9 宽折沿、束颈、腹部饰双竖桥耳，与大南沟 M29: 1^[17]特征一致，年代相若；fig. 22—10 折沿、弧腹、腹部饰双耳，依据大南沟小河沿文化墓地的陶器排序，该器从形态上要早于侈口盆发展序列的早期形式^[18]。

B类 夏家店下层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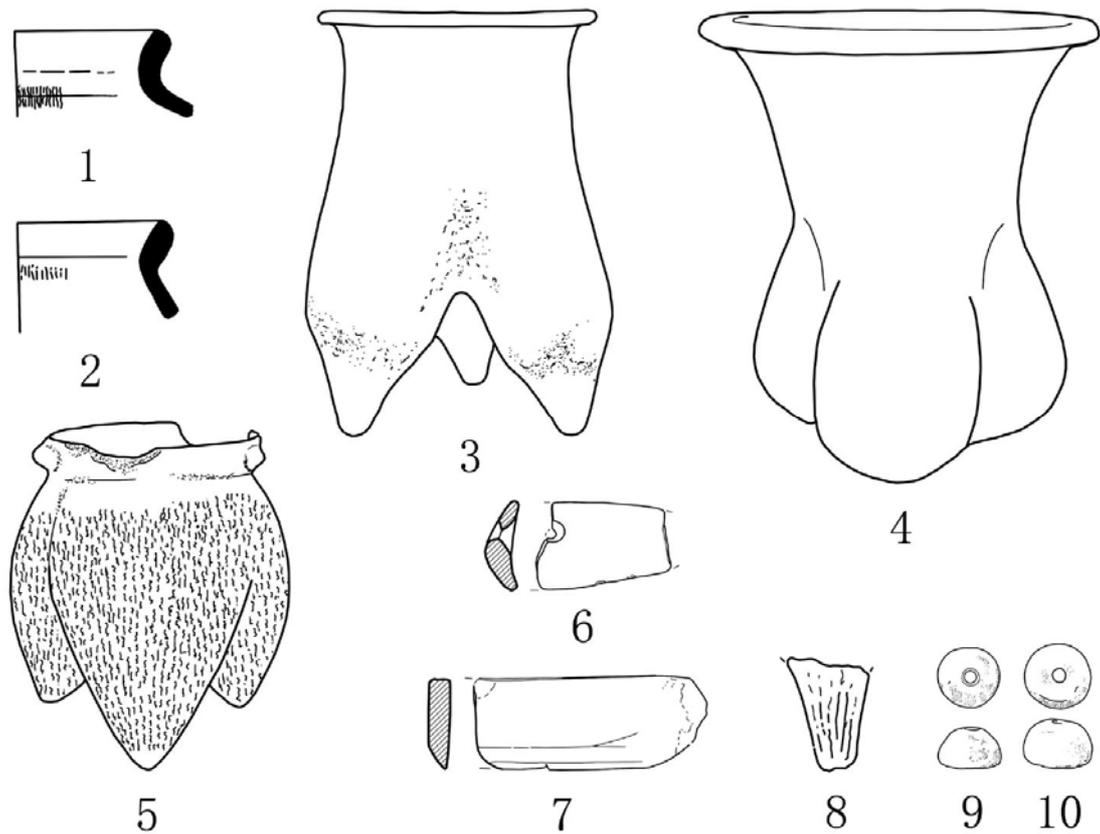
这类遗存标本相对较多，第 I 住地、L 地点、N 地点及“红陶系”收集品中都有发现，绝大部分为“红褐色绳纹陶”，红山各地点采集到的一部分石器也属此类^[19]。

第 I 住地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皆为残片，没有完整器。如标本 XXV—5^[20]、7 饰绳纹或绳纹加划纹的陶片（图二，9、8），XXV—34、37 饰绳纹的口沿（图四，1、2），XXV—59 饰绳纹的鬲（鼎）足残片（图四，8）；L 地点、N 地点采集的饰红褐色绳纹或绳纹加划纹的陶片 XXVIII—12~15、22、57、65（没有线图，只有照片）；“红陶系”收集品中的 fig. 21—15、fig. 22—14 尊式鬲（图四，3、4），fig. 21—16 绳纹袋足鬲（图四，5）等。从上述标本的陶系、形制和纹饰风格看，当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此外，Ib 地点发掘的扁长条形石刀（图四，7）、第 I 住地采集的截面呈三角形的石刀（图四，6）以及“红陶系”收集品中的算盘珠状纺轮（图四，9、10）也属夏家店下层文化^[21]。

需要说明的是，《红山后》认为 XXV—34、37 口沿与包头附近所出的黑色绳纹罐^[22]口沿形制相同，文化性质一致。实则不然，XXV—34、37 为红褐色陶，包头罐则为黑灰色陶。这

件包头罐应该是包头地区战国—汉代的遗物，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无涉。

fig. 21—16 绳纹袋足鬲，口沿饰圆形扳钮、器身饰细密绳纹，与刘观民先生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蛇纹鬲^[23]形体相似。这种形态的鬲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不是很多，却是朱开沟文化的典型陶鬲^[24]。而夏家店下层文化尤其是西区较常见的罐或鬲等口沿带扳钮的作风也属于来自朱开沟文化的因素^[25]。那么，fig. 21—16 当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来源于朱开沟文化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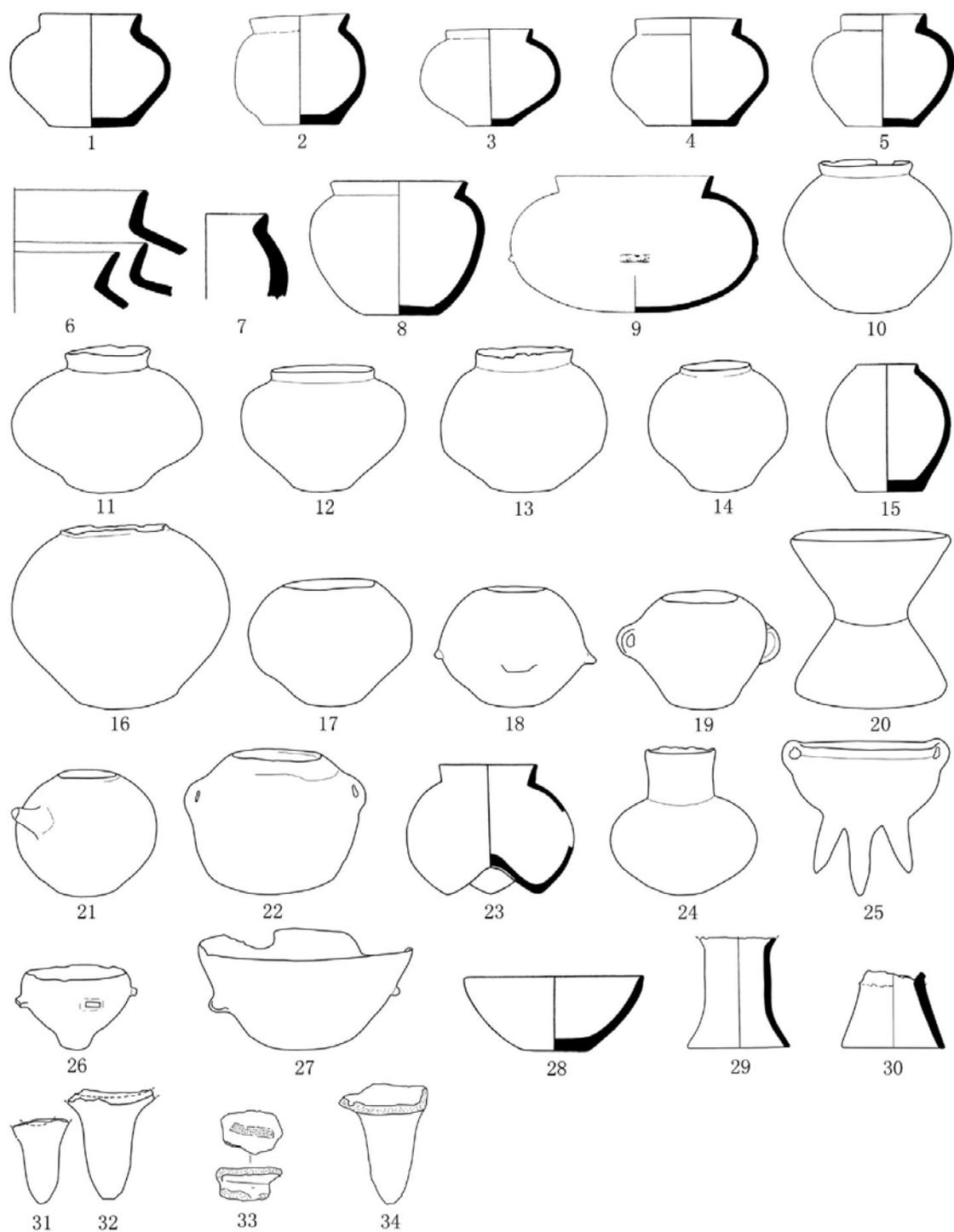


图四 B类遗存 (1/3)

1、2、8. Ic地点 (XXV—34, XXV—37, XXV—59) 3、4、5、9、10. “红陶系”收集品 (fig. 21—15、fig. 22—14、fig. 21—16、fig. 23—14、fig. 23—15) 6. 第 I 住地采集品 (XXVI—21)
7. Ib地点 (XXVI—23)

C类 夏家店上层文化

此类遗存最多，在“赤峰第二期文化”包括的各个地点遗存中都有发现，其中尤以红山后石棺墓（主要是A、D墓地）的发现最为集中。A、D墓地共发掘30座墓，皆单人葬，多侧身直肢、仰身直肢。多数墓葬在头侧随葬一个夹砂罐（图五，1、5、8、15、23、28），另有若干骨镞以及少量的青铜、玉石类遗存（图六，2、11~14、24、25；图七，1、2；图八，1~3、6~11）。这批墓葬的文化内涵相同，随葬的陶罐皆夹砂红褐陶、素面，多为矮领、侈口、折沿、沿内抹斜，其风格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出土遗物一致。朱永刚先生曾根据这批墓葬出土陶罐矮领、侈口、鼓腹的风格与夏家店遗址晚期单位所出的乳足鬲的对比，认为这批石棺墓应与夏家店遗址晚期单位的年代相当，属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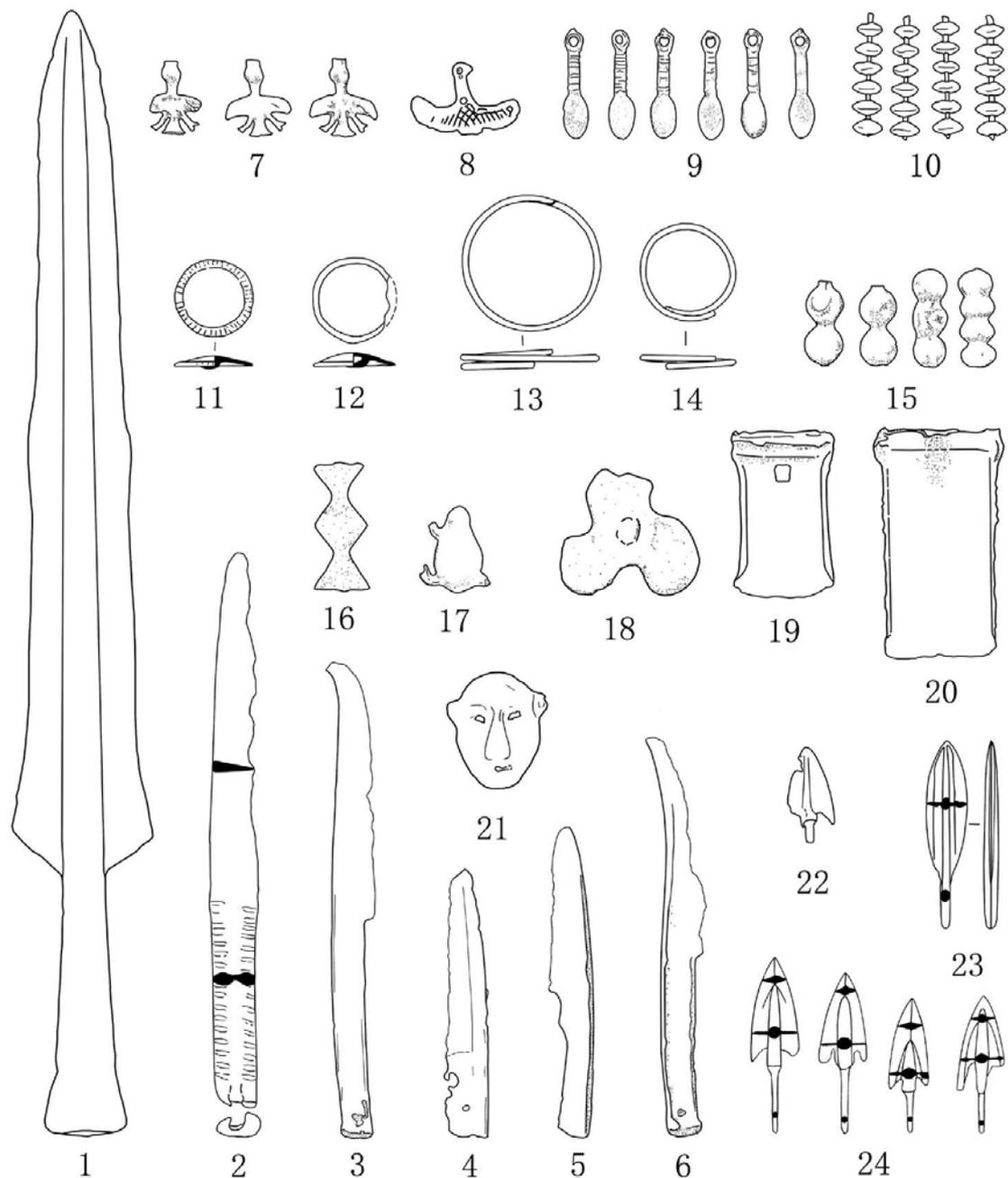


图五 C类遗存——陶器（7为1/3，余皆为1/6）

1、15、23、28. A 墓地 (M6: 1, M18: 1, M7: 1, M16: 1) 2、3. 红山一带采集 (XXVI-1、4)
 4、30、34. L 地点 (XXVI-3、9, XXVIII-31) 5、8. D 墓地 (M3, M1) 6、9、29、31、32. Ia 地
 点 (6为 XXV-60、69、70、9、29、31、32为 XXVI-2、XXV-86、XXV-104、XXV-102) 10-14、16~
 22、24~27. “红陶系” 收集品 (fig. 21-1、3、5、7、4、2、8、14、13, fig. 22-6、11, fig. 21-12、
 11, fig. 22-13, fig. 21-19、20) 7. Ib 地点 (XXV-9). 33. N 地点 (XXVIII-60)

第 I 住地的三个地点皆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其中 Ia 地点最丰富。Ia 地点清理到的遗迹可能是个残房址，所出遗物绝大部分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如居住面上所出的标本 XXVI-2 (图五, 9)，具有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折沿罐的作风。其它如 XXV-60、69、70、86 皆

属此类(图五, 6、29); Ib 地点红色磨光陶的一部分可能属夏家店上层文化, 但能确认的仅标本 XXV—9(图五, 7); Ic 地点多红褐色或灰色绳纹陶, 仅标本 XXV—63 能确定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此外, 第 I 住地及其附近还采集到若干夏家店上层文化石器, 如标本 XXVI—14 石制斧范(图七, 12)、XXVII—5 有孔石斧(图七, 5)、XXVII—11 槌斧(图七, 13)、XXVII—13 槌斧(图七,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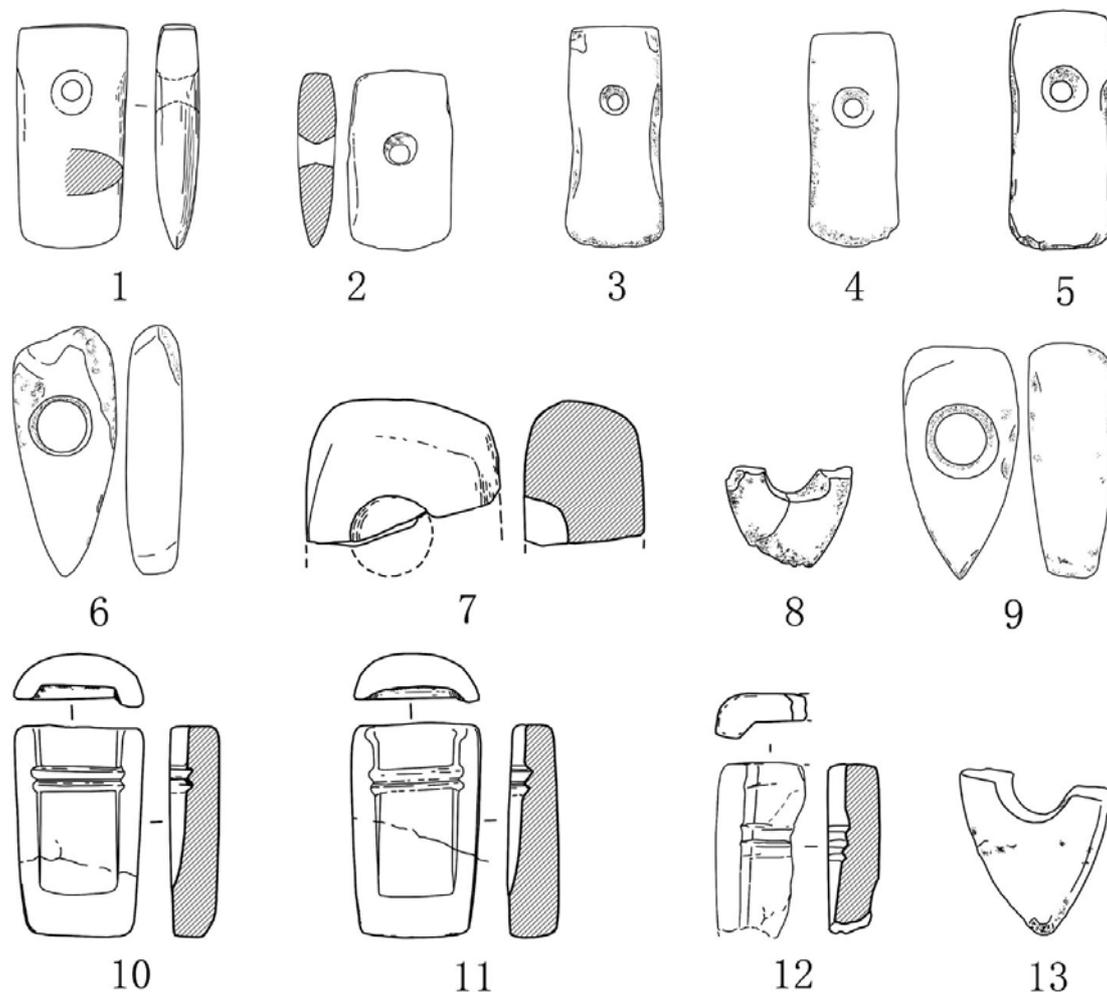


图六 C类遗存——青铜器(约 1: 2.5)

1、3~10、15~22. 红陶系收集品(fig. 24—19、22、3、7、4、1、2、8、6、9、23(1)、23(2)、5, fig. 20, fig. 24—21(1), 其中 fig. 24—22 包括 3、4、5、6 共 4 件青铜刀) 11~14、23. A 墓地(M7: 4、M11: 1、M18: 6、M25: 5、M22: 5) 2、24. D 墓地(皆为 M2 所出)

L 地点、N 地点的红色磨光陶多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如标本 XXVIII—31 锥状足根(图五, 34)、XXVI—3 陶罐(图五, 4)、XXVI—9 “器座”(图五, 30)、XXVIII—60 长方形扳耳(图

五, 33) 等; P 地点遗物较少, 仅标本 XXVII—3 槌斧可确定为夏家店上层文化 (图七, 8)。P 地点其它遗物都是石器, 采用间接打片、压制修理技术, 难以确定是否与槌斧的文化内涵一致; Q 地点、M 地点只发现了石棺墓, 没有收集到遗物, 从红山一带石棺墓的文化属性看, 初步推测应属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此外, 尚有一些出土地点不明的遗物, 如标本 XXVI—1、4 陶罐等皆属夏家店上层文化 (图五,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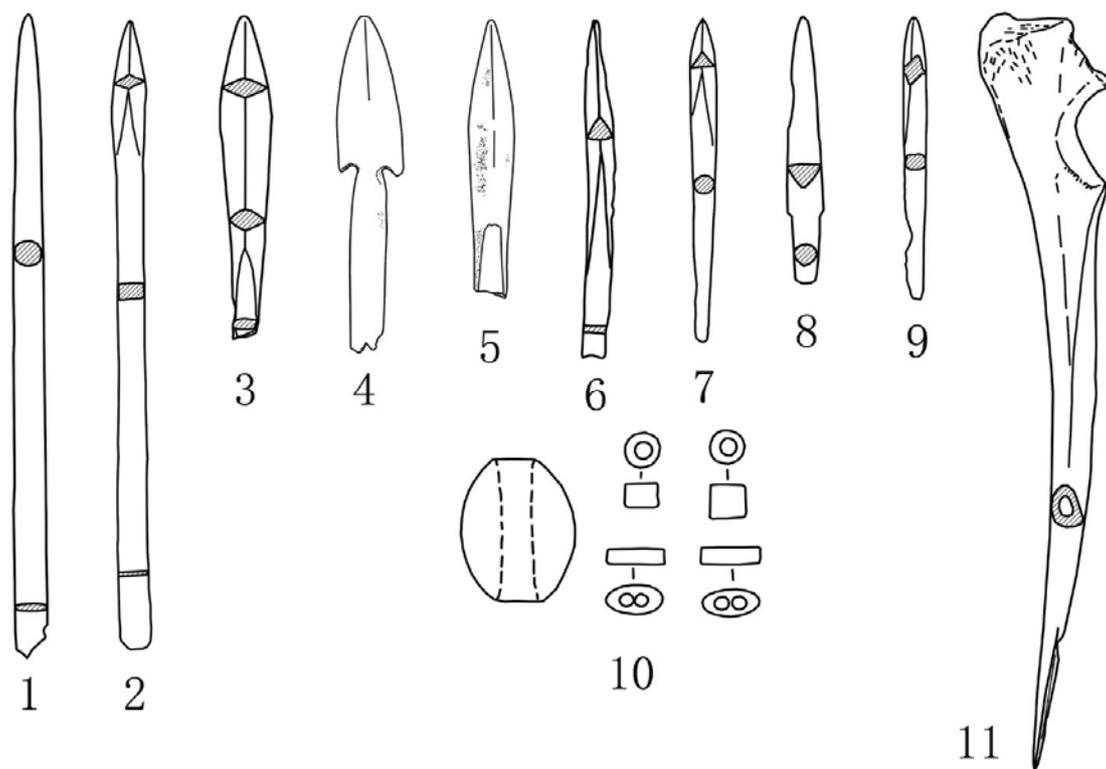


图七 C类遗存——石器 (1/3)

1. A 墓地 (M3: 2) 2. D 墓地 (M2 所出) 3、4、6、9、10、11. “红陶系”收集品 (fig. 23—4、7, fig. 23—1、2, XXVI—15 (1)、XXVI—15 (2)) 5、13. 红山后采集 (XXVII—5、XXVII—11) 7. Ic 地点采集 (XXVII—13) 8. P 地点 (XXVII—3) 12. Ib 地点采集 (XXVI—14)

“红陶系”收集品中, 很大一部分属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如标本 fig. 21—1、3、5、7 矮颈罐 (图五, 10~13), fig. 21—2、4 短颈罐 (图五, 16、14), fig. 21—8、12、13、14 敛口罐 (图五, 17、22、19、18), fig. 22—11 带流罐 (图五, 21), fig. 21—19 敛口钵 (图五, 26), fig. 21—20 盆 (图五, 27), fig. 22—13 鼎 (图五, 25), fig. 21—11 壶 (图五, 24); 青铜器主要是工具武器类, 另有一些小饰品, 没有青铜容器。如标本 fig. 24—19 鍪柄剑 (图六, 1)、fig. 24—21 (1) 双翼有铤铜镞 (图六, 23)、fig. 24—22 青铜刀 (图六, 3~6)、fig. 24—23 青铜斧 (图六, 20、21) 以及 fig. 24—1~8 等装饰品 (图六, 7~10、15~18、21); 石器、骨器也很多, 如标本 fig. 23—1、2 槌斧 (图七, 6、9), fig. 23

—4、7有孔石斧（图七，3、4），fig. 25—7（1）、fig. 25—7（2）骨镞（图八，4、5），文化性质比较清楚。另外，从岛村处购得的两件石制斧范亦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图七，10、11）。



图八 C类遗存——骨器、玉石（2/3）

1、3、6、8、10、11. A墓地（M18: 2、M18: 5、M3: 3、M22: 4、M21: 2、M1: 2） 2、7、9. D墓地（皆为M2所出） 4、5. 红陶系收集品（fig. 25—7（1）、fig. 2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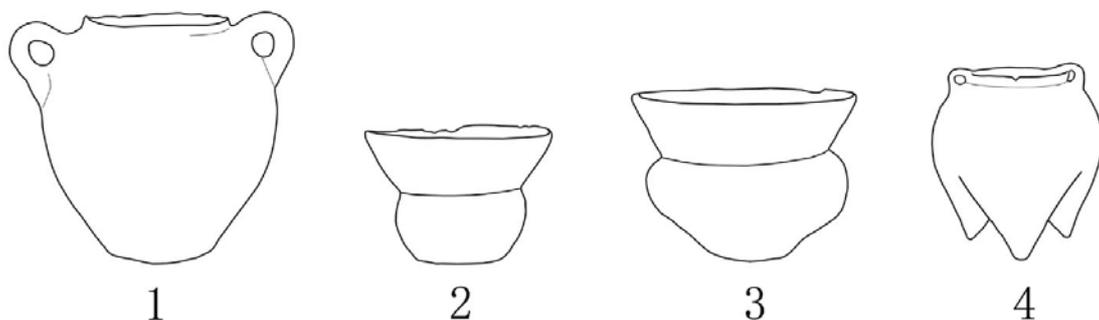
从随葬品来看，红山后A、D墓地的文化属性较为一致，年代亦相近。如随葬陶罐多为矮颈、侈口，属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风格。根据龙头山遗址发掘材料所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期研究也将A墓地M3划作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遗存^[27]；D墓地M2所出四件双翼铜镞年代应在春秋中期前后^[28]；收集的“红陶系”遗物也反映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晚期的风格，如fig. 24—22两件青铜刀较南山根M101: 54^[29]刀首略翘，年代亦稍晚。但是有的器物也反映出较早的风格，如fig. 24—19釜柄剑（《红山后》误称为“矛”），柱脊中央有脊突，刃部经打磨，略显波曲，叶尾折收。该剑形制上大体接近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30]，年代应在西周中期前后。朱永刚、刘国祥等先生的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31]。这似乎表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在红山一带可能延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此外，从Ib地点采集的石制斧范以及收集的两件斧范看，红山一带的青铜冶铸当时采用二合范技术，这为探讨夏家店上层文化冶铸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尤其是Ib地点斧范的发现，至少说明红山一带当时可能存在冶铸铜器的作坊。

D类 水泉文化

水泉文化是以敖汉旗水泉墓地北区遗存为代表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32]。目前仅水泉墓地经过系统发掘，资料比较集中。此外，在宁城三座店、喀喇沁旗大山前等地点也有零星采集品，据说赤峰初头朗还清理了类似水泉墓地北区遗存的墓葬，但资料未经公布^[33]。按照郭治中先生的看法，水泉文化以外叠唇和肩双耳、单耳结合的夹砂叠唇带耳罐为主要特征，其

相对年代介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燕文化之间。该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老哈河流域。水泉文化是赤峰地区晚期青铜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为我们重新认识“赤峰第二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九 D类遗存(1/5)

1—4. “红陶系”收集品(fig. 22—7, fig. 21—18、17, fig. 22—12)

“红陶系”收集品中，标本 fig. 22—7 双耳罐（图九，1），敛口，肩饰双耳，最大径在腹中部偏上，为水泉文化的典型器物。从这类器物的排序看，当与水泉 III 式双耳罐（水泉北区 M73: 1）形体相似，年代亦相近。I 式双耳罐在水泉墓地北区 M79 中有发现，根据同墓所出之戈（M79: 2）援身上扬与内成一定角度的风格，可将 I 式双耳罐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则标本 fig. 22—7 双耳罐的年代当不早于战国早期。

标本 fig. 21—17、18 敞口盂（图九，3、2），大口外敞，鼓肩或鼓腹，平底，与水泉南区 M108: 2 相似，属于敞口盂发展序列的较晚形式^[34]。敞口盂最早出现于魏营子文化阶段，在“凌河文化”^[35]中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器类。鉴于红山一带当时可能正处于水泉文化的分布区，所以推测收集的这两件敞口盂很有可能是“凌河文化”对水泉文化影响的产物，文化性质上属于水泉文化。这表明在水泉文化集中分布的赤峰南部地区，也存在“凌河文化”因素。实际上，水泉墓地的发掘就已经揭示出水泉文化（水泉墓地北区遗存）和“凌河文化”（水泉墓地南区遗存）的复杂交流影响关系，如属水泉文化的北区墓葬 M50、M55 中分别发现有“凌河文化”的泥质敞口盂、侈口罐。可见，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标本 fig. 22—12 鬲（图九，4），口饰双耳、鼓肩、肩以下三个袋足。传“凌河文化”中曾出一件肩饰单耳的袋足鬲^[36]，总体风格与此一致，时代应大体相同。由于该件器物收集于赤峰一带，故推测其当属水泉文化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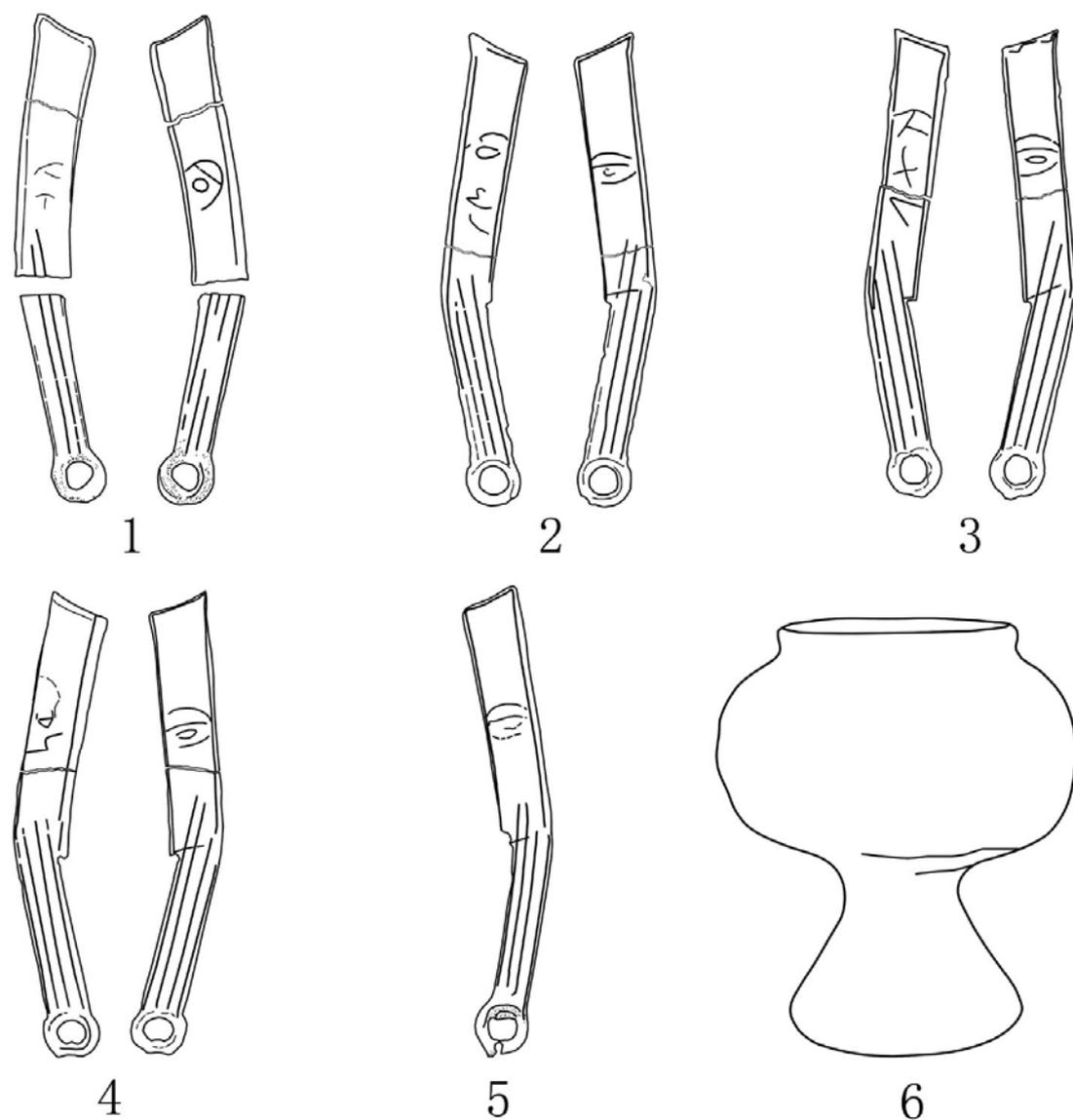
E类 燕秦汉遗存^[37]

此类遗存在“赤峰第二期文化”中较少，能够辨别的仅是 Ic 地点部分泥质灰陶陶片^[38]以及“红陶系”收集品中的 fig. 22—5 小口壶（图十，6），fig. 24—24、25 明刀（图十，1~5）。

“红陶系”收集品中，fig. 22—5 小口壶以及 fig. 24—24、25 明刀可以明确断为战国燕文化遗物。fig. 22—5 小口壶（《红山后》称“圈足壶”），小直口、扁腹、短柄、圈足，当属燕文化仿铜陶礼器。按照郑君雷先生所排的战国燕墓小口壶的壶盖从覆杯式渐成覆钵式、壶柄从高渐矮的演变序列^[39]，《红山后》短柄小口壶应不早于战国中期晚段。

至于 fig. 24—24、25 明刀，陈梦家先生早就指出这类刀为燕国的刀货^[40]。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并且倾向于认为此类刀当是由燕币尖首刀发展而来^[41]。明刀的铸行年代一

般认为是从春秋晚期直到战国晚期。依照石永士等先生对明刀的排序^[42]，fig. 24—25(1)当属 III 式，其余皆为 VI 式（“磬折刀”或“折背刀”）。Fig. 24—24 虽然字迹模糊，从轮廓上仍大致可以看出属 VI 式。按照石先生的看法，III 式刀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后段，VI 式为战国晚期。



图十 E 类遗存（战国燕文化部分）（6 为 1/3，余皆 1/2）

1—6. “红陶系”收集品（fig. 24—25(1)~(4)，fig. 24—24，fig.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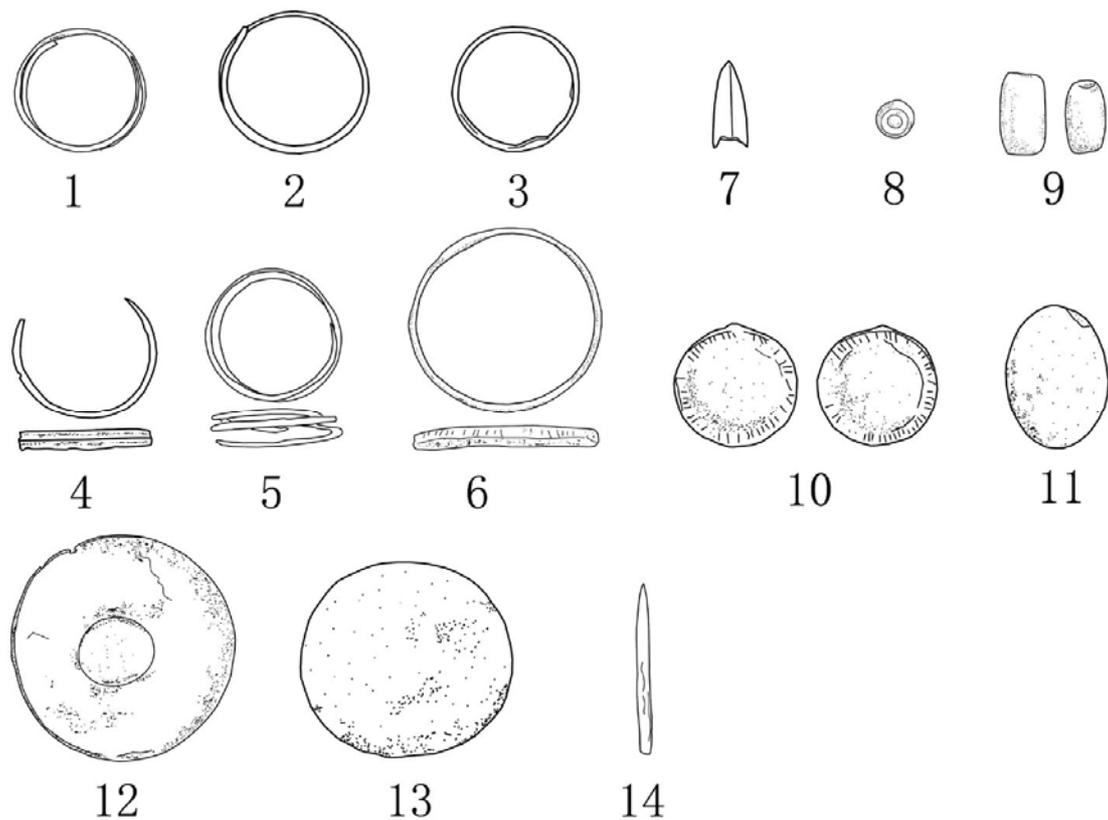
《红山后》认为，明刀与红山一带收集的“红陶系”青铜器的年代关系密切，属于同一文化范畴，故而也被作为判定“赤峰第二期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并且认为是“中国”文化当时到达赤峰地区的实证^[43]。由于明刀作为战国燕文化遗物从“赤峰第二期文化”中析出，《红山后》一书的论断也就不能成立了。

F 类 辽代前后的遗存

“赤峰第二期文化”中能明确断定为辽代前后遗存的仅是 Ib 地点发掘的泥质篦点纹灰陶片^[44]（图二，17）。这种陶片质地坚硬，篦点纹细腻，在辽西地区魏晋至辽金时期的各遗

址堆积中常见，我们在赤峰地区的田野工作中也经常发现。

除上述六类遗存外，“赤峰第二期文化”中尚有一部分遗物不能确定其文化属性，如“红陶系”收集品中的玉珠（图十一，8、9）、玉管、蚌饰、耳环（图十一，1~6）、铜泡（图十一，10、13）、铜锥（图十一，14）等。这些东西在赤峰地区延续的时间很长，不是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指征性器物，虽然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发现不少，但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之后的水泉文化、井沟子类型^[45]中仍有延续，尚不宜确定这些遗物的文化性质。fig. 24-21(2)铜镞（图十一，7）的文化性质还不能确定。按照《红山后》一书的描述，此镞为双翼，镞身截面为菱形，有后锋，其基本形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骨镞一致，但井沟子类型中也有这种骨镞，都没有发现这种形制的铜镞。fig. 20 铜镜（图十一，12）的文化性质也难以明确^[46]。至于那件椭圆形铜泡（图十一，11），若背后带双梁，则有可能是汉代遗物^[47]。



图十一 “红陶系”收集品中年代不明确的青铜器（1/2）

1—6. 耳环 (fig. 24—13~18) 7. 铜镞 (fig. 24-21(2)) 10、11、13. 铜泡 (扣) (fig. 24—10、12、11) 8、9. 玉珠 (fig. 25—2) 12. 铜镜 (fig. 16) 14. 铜锥 (fig. 24-20)

此外，由于受到文字描述、照片的局限，Ib 地点下层所出的灰色压印斜线纹陶片的文化性质也很难确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平底罐、特别是陶爵上倒是很常见^[48]，文化性质可能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赤峰第二期文化”实际上至少包含六类（或阶段的）不同的文化遗存，即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文化、燕秦汉遗存、辽代前后的遗存，并不是像以往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那样只包括了两种考古学文化。过去我们认识的偏差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红山后》所谓“赤峰第二期文化”包括的内容，没有注意到“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涵不只限于石棺墓和第 I 住地的遗存，而是包括红山一带多

个地点的遗存，特别是对那批收集的“红陶系”遗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缺乏可资对比的材料，以致我们即使注意到那批“红陶系”遗物，也不能正确辨析。所以，我们今天认识的突破也要归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发展。

附记：承蒙王立新教授悉心指导，颇有所获，十分感谢。此外，吴丽丹、魏婧、张函在日文解释方面给予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38.
- [2] 吕遵谔. 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J]. 考古学报，1958，(3)：26.
-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 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1961，(2)：80.
- [4]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38. 该书第五章、第六章里分别专门讨论赤峰第一期文化（红陶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彩陶文化），并有相关年代推测。第七章结言中对赤峰先史文化做了概括，认为红陶文化和彩陶文化差异显著，虽然可以在红陶文化中找到一些承袭彩陶文化的因素（见《红山后》fig. 59. fig. 59 即第五十九图，下同，不赘述），但发展过程不清晰，存在明显缺环。第七章同时还提到赤峰第三期文化（灰陶文化），以红山前面 Q 地点灰陶遗物为代表，认为赤峰灰陶为汉式陶器，是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北进的产物，并最终代替了赤峰第二期文化。根据“绥远青铜器”和明刀钱的年代，推测赤峰第二期文化与秦式、汉式文化并行发展。《红山后》文后的英文说明则将年代确定在约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大致从春秋晚期到西汉初年。
- [5] “绥远青铜器”历史上又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由于这种青铜器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而不是限于某个地区，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称北方系（式）青铜器。
- [6]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38：36、37、40.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在书中多次指出第 I 住地与石棺墓的文化属性一致。
- [7] 槌斧见《红山后》PL. XXVII—11、12、14，有孔石斧见 PL. XXVII—5、6. PL. XXVII—11 即图版二七~11，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直接称“XXVII—11”，省去“PL.”。
- [8] M 地点发现石棺墓（《红山后》，第 5 页）；L 地点、N 地点发现红色磨光陶、红色绳席纹陶等遗物（《红山后》，图版二八），N 地点、O 地点还发现石棺墓（《红山后》，第 7 页）；P 地点发现槌斧及细小石器（《红山后》，图版二七）。关于 L 地点、N 地点、P 地点遗物与石棺墓、第 I 住地遗物的一致性，在《红山后》中也有论述（《红山后》，第 36 页）。
- [9] 这部分“红陶系”收集遗物见《红山后》fig. 21—fig. 25. 所属文化系统的论述见《红山后》第 37 页。
- [10]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38：30.
- [11]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38：32—34. 后三种在《红山后》中归为杂类。第 37 页注释（7）中特别提到篦点纹陶片（报告称“栉齿列点

纹”),认为其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为唐代以后的遗存,在宁安渤海宫殿址以及沈阳辽代石棺墓中都有出土。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 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 1961, (2): 81, 注释[12].

[13] 小河沿文化遗存在《红山后》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中也有发现. 以前即有学者指出, fig. 22—1 绳纹筒形罐为小河沿文化的典型器物(李恭笃, 高美璇. 试论小河岩文化[A].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赤峰第一期文化”绝大部分遗存属红山文化,《红山后》未能将其与小河沿文化区分开来. 可见,“赤峰第一期文化”也混杂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不拟作详细讨论.

[14]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 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1, 图一.

[15]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 克什克腾旗上店小河沿文化墓地及遗址调查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2, (1)(2)合刊: 77-83.

[1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 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 考古与文物, 2004, (1): 7.

[17]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 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34, 图三六, 5. 需要指出的是, M29: 1 虽为 A 型侈口盆, 但束颈较高, 与其它 A 型侈口盆明显不同. 此外, 图三六~5 与图版二五~2 有出入. 按照图版, 折沿下有一段直颈, 而线图则没有. 本文以图版为准.

[18] 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 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64—65, 图五七.

[19] 夏家店下层文化虽以泥质灰陶为主,但由于受下辽河流域素面陶系统高台山文化的影响,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也出现数量颇多的红褐陶. 具体论述见朱永刚. 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A], 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49.

[20] 《红山后》发表的陶器线图, 石棺墓用墓号标记单位, 同一墓器物编为同号者, 质地、形制皆相同, 故发表的墓葬器物线图多有同号者, 如 III—3 就有 4 件; 遗址及采集品的器物线图按图版编号, 而图版则按地点编排. 至于收集的“红陶系”遗物, 只有照片, 没有线图, 集中编在第二十一图(fig. 21)至第二十五图(fig. 25)中.

[21] 《红山后》中被归入“彩陶系”的标本 fig. 23—11 弯月形石刀亦属夏家店下层文化, 但不属于“赤峰第二期文化”(“红陶系”), 故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仅在此指出.

[22] 东亚考古学会. 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M]. 东京: 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 1938: 33, fig. 16.

[23] 刘观民. 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几件陶器的分析[A].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373, 图四, 2.

[24] 根据王乐文的研究, 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可以分成甲、乙两类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朱开沟文化是指以肥袋足高、带钮罐、敞口盆形甗、敞口盆为典型器物的乙类遗存, 与以扳手高、敛口斜腹甗、折肩罐为典型器物的甲类遗存有着明显的区别. 具体论述见王乐文. 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 2003. 本文所指朱开沟文化即采用王乐文的观点.

[25] 王立新, 卜策大. 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源流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的再认识[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

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8年: 185.

[26] 朱永刚.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A].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一)[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00.

[27] 王立新, 齐晓光.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J]. 北方文物, 2002, (1): 18.

[28] 刘国祥.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J]. 考古学报, 2000, (4): 462, 481. 参照刘先生的分期, 双翼三角形镞(Cb型)的演变趋势为翼两侧由斜直外撇渐成弧状略内收, 锋部则越来越长. 刘先生将《红山后》A墓地M22之镞归入第六期, 属春秋中期早段, 与之同时的还有D墓地M2的一件铜镞, 而D墓地M2的四件双翼铜镞形态基本一致, 年代亦相近.

[29]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 (2): 图版玖, 6.

[30] 贾洪恩. 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J]. 文物, 1984, (2): 52, 图二, 1, 2.

[31] a. 朱永刚. 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釜柄式柱脊短剑[J]. 文物, 1992, (12): 66. 朱先生将红山后釜柄剑归入AII式, 由于晚于AII式剑的AIII式剑在南山根M101中与中原式青铜礼器共出, 年代推定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那么, 红山后釜柄剑的年代可推定为西周中期晚段或西周晚期早段.

b. 刘国祥.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J]. 考古学报, 2000, (4): 458, 481. 参照刘国祥先生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分期图, 红山后釜柄剑与AbII式、AbIII式剑相似, 应归入第三期, 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晚段, 与朱永刚先生的相关推断近似.

[32] 郭治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305.

[33] a. 三座店单耳罐见宁城县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北考古专业. 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A]. 文物资料丛刊: 9[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40, 图三九, 3.

b. 大山前双耳罐见赤峰考古队.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19, 图八, 12.

c. 初头朗战国墓葬见郭治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305. 资料未发表, 郭先生在文中提到.

[34] 郭治中. 水泉墓地及相关问题之探索[A]. 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306, 307. 郭先生在文中认为敞口盂经历一个由瘦腹到鼓腹、上半部渐趋加长、最大径上移的过程. 红山一带收集的这件敞口盂当处于这一序列的晚段. 需要说明的是, 郭先生在文中所指凌源河汤沟之敞口盂应是喀左南沟门之误, 河汤沟不见这类器物.

[35] “凌河文化”被有的学者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大、小凌河流域的地方类型(靳枫毅. 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J]. 考古学报, 1987, (2): 187, 188. 靳先生称“十二台营子”类型). 但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却显示, 辽西地区的青铜文化自商末周初起就以努鲁尔虎山为界, 并存着东西两个发展系统(朱永刚. 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二辑[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71). 卜箕大先生则将大、小凌河流域自魏营子文化以后至战国燕文化之前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凌河文化”(卜箕大.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D]. 长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1998: 77).

[36] 此鬲为朝阳袁台子所出, 资料未发表, 朱永刚先生调研时曾见到过, 卜箕大先生将其归为凌河文化. 见卜箕大. 辽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D]. 长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学位论文, 1998: 图二三, 2.

[37] 由于赤峰地区战国时期燕文化与秦汉时期的遗存很难区分开,故不宜作详细划分,拟统称为燕秦汉遗存。

[38] 如标本 XXV—36、XXV—54。按照《红山后》的看法, Ia 地点出红色磨光陶, Ib 地点绳纹陶很多, Ic 地点红褐色绳纹陶占优势,并有黑色绳纹陶出土。结合 Ib 地点南北沟的层位关系揭示出红色磨光陶向绳纹陶发展的关系,推测最初 Ia、Ib 地点是居住址,后来北移到 Ib、Ic 地点。可以看出,滨田耕作等认为第 I 住地三个地点是使用上先后不同的居住址。《红山后》第 36 页注释(1)认为,红色磨光陶与黑色绳纹陶(灰陶)显然是一类,红色绳纹陶的发现正好可以填补两者之间发展的缺环。这样看来,属赤峰第二期文化的 Ic 地点出土相当数量的灰陶片应该是赤峰第二期文化与秦式、汉式文化(灰陶文化)并行发展过程中受灰陶文化影响的产物。此外,汉式陶器在红山前面 Q 地点发现很多,但 Q 地点遗存不属“赤峰第二期文化”,而是灰陶文化即“赤峰第三期文化”的内容,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需要说明的是, Q 地点也不是完全的汉式灰陶,其中至少混杂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如标本 XXVIII—34,说明 Q 地点的文化面貌也不单纯。

[39] 郑君雷. 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J]. 考古学报, 2001, (3): 278, 279, 291.

[40]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二)·战国燕刀货[J]. 考古学报, 1955, (10): 128.

[41] 这类刀的面文有多种释法,其中以释“明”、释“匱”两说影响较大。吴良宝博士在总结了多种释法后认为,释“匱”一说所依据的《钱典》和《中国古钱谱》中的字体在建国以来出土的十余万枚明刀币中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本文从其说。具体论述见吴良宝. 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2003.

[42] 石永士, 王素芳. 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A]. 中国钱币论文集: 第二辑[C].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38—65.

[43] 《红山后》是旧中国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产物,书中掺杂了殖民主义的色彩,称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为“中国文化”即是一例。

[44] 篦点纹陶片已被《红山后》认作是唐代以后的遗存(见《红山后》第 37 页注释(1)),不属于“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容,但所指仅是第 I 住地地表及表土中所见者。实际上, Ib 地点下层中也有一片篦点纹陶(《红山后》fig. 17—17)混杂在其它陶片中,属于“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内容,实际应是该地区辽代前后的遗存。

[45] 井沟子类型是以 2002 年发掘的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葬命名的一种文化类型。该类型的墓葬上半部被扰动,多随葬大型素面夹砂罐,用牲较普遍,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从时间、地域、经济形态看,与文献中记载的东胡关系密切。具体论述见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2 年内蒙吉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 考古与文物, 2004, (1): 15—18.

[46] 按照宋新潮先生的看法,中原地区殷商时期流行饰几何纹的铜镜,而西周铜镜绝大多数为素面,西周的纹饰镜主要饰线描动物纹。这与黄河上游、北方长城沿线以及新疆地区的铜镜在形制和纹饰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宋新潮. 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J]. 考古学报, 1997, (2): 153—160)。从图上观察, fig. 20 铜镜为圆形素面,镜背沿稍卷,钮为圆形,与宋先生在文中列出的南山根所出十一面夏家店上层文化铜镜形制较为相似,但其圆形钮的风格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饰桥形钮不同。战国以降、特别是西汉以后的铜镜虽然流行圆形钮,但多纹饰精美。加之铜镜出土地点不祥,没有共存器物可资比较,所以很难确定这面铜镜的文化性质。

[47] 林沅. 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A]. 林沅学术文集[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56. 林先生在文中将彩岚墓地、榆树老河深所出的此类双梁椭圆形铜泡确定为汉代遗存,颇有道理。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葬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82, 图四一.

Rethinking of the Second Culture in Chifeng

Wu Zhijia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Second Culture in Chifeng in the book of *the Hongshanhou, Chifeng* are very complicated, which were considered that it included two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remains of the Second Culture in Chifeng, we find that it includes at least six different kinds (or stages) of remains: Xiaoheyuan Cultur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Shuiquan Culture, Remains of Yan-Qin-Han Dynasties and Remains about Liao Dynasty.

Key words: the Second Culture in Chife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 remains

收稿日期: 2004 - 04 - 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01JAZJD780003)

作者简介: 武志江 (1979 -), 男, 山东诸城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